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 期
第 55-74 頁 2000 年 11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皓首同歸兩心知

——試論劉禹錫與白居易的際遇與詩藝

李寶玲*

摘 要

這篇論文旨在藉著比較劉禹錫與白居易的起落際遇和詩藝發展，來呈現二者詩作的特質。

這兩位中唐大家有其個別的養成背景和政治上的遭遇，他們對其時代的觀察和感受，也因之各有不同。

不過，後來二人之間卻一直靈犀相通，精神上非常投契；而他們深固的友誼，更常與其詩藝創作互動互染，令人神往。

關鍵詞：劉禹錫、白居易、唐詩、劉白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講師

前言

代宗大曆年間，盛唐以來的重要詩人相繼去世，而中唐的代表詩人們陸續出生；經過二十多年的淬鍊之後，才登上詩壇。所以從大曆初到德宗貞元的二十多年間，是唐詩發展較晦暗的時期。成長過程飽經戰亂之苦的中唐詩人們，如何在詩歌發展過程幾乎面臨一段真空之後，一方面能承繼起盛唐的昂揚氣象，一方面又能開創出自己的時代風格，一直是唐詩研究者注目的一個焦點。

在中唐詩的發展、特色、價值、影響等方面，都已有許多研究成果；尤其是對元和詩的研究，成績更是斐然可觀。可惜這些論述，大多著眼於時代對詩人影響的共相。其實不同的詩人，雖然共同經歷了同時代的許多重大事件，但是他們對同樣的社會現狀、同樣的歷史事件所持的態度，也會因著不同的家世背景、不同的養成教育、不同的政治升遷、不同的居住環境，而產生顯著的區別。

劉禹錫與白居易這兩位詩人，便是最好的例子。代宗大曆七年（西元七七二年），詩歌理論家元結過世，劉禹錫與白居易也在這一年誕生。唐武宗會昌二年七月（西元八四二年），劉禹錫卒於洛陽，享年七十一歲；會昌六年八月（西元八四六年），白居易亦卒於洛陽，享年七十五歲。劉、白二位詩人一生中竟有七十一年多的歲月是重疊的，他們共同經歷了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和武宗等八位皇帝。他們成長的環境都是德宗在政策失敗後，完全不敢有所作為的保守年代。皇帝對藩鎮一味姑息縱容，坐視他們聚斂無度，朝廷官吏則苟且因循，釀成一個政治升遷管道停滯不公、政府對百姓剝奪侵擾的紊亂時代¹。他們都是二十幾歲參加科舉，擢進士第，又應吏部試連登三科後進入仕途。他們從政時間皆始於貞元時期，而且都是先做幾年地方小官，再陞任朝官。如劉禹錫於貞元十一年（西元七九五年）為太子校書，此後入徐泗濠節度使杜佑幕下掌書記，又調補京兆渭南縣主簿，至貞元十九年（西元八〇三年）晉為監察御史；白居易於貞元二十年（西元八〇四年）為校書郎，後歷任盩厔尉、進士攷官、翰林學士，至元和三年（西元八〇八年）任制策攷官、左拾遺，並依前充翰林學士。他們都有連續被貶謫的經驗，如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西元八〇五年）九月劉禹

¹ 元稹在〈敘詩寄樂天〉一文中說：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聞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眾，橫相賊殺，先變駱驛，使者迭窺。頃以狀聞天子曰：「某邑將某能遏亂，亂眾寧附，願為帥。」名為眾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援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自為旨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几閣，其者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之。朝廷大宦以謹慎不言為樸雅，以時進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五仰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墮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今有司備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剝奪百貨，勢不可禁。」見《元稹集》卷三十、三五二～三五二

錫貶連州刺史，十一月旋即再貶為朗州司馬，而白居易在唐憲宗元和十年（西元八一五年）八月，先貶刺史，後王涯復論不當治郡，追改江州司馬。他們都有將與好友酬唱之作編成集子的習慣；如劉禹錫將其與李德裕唱和詩篇，編成《吳蜀集》一卷，並作《吳蜀集引》，又將其與令狐楚唱和詩篇編成《彭陽唱和集》；而白居易續元稹之《因繼集》，將兩人唱和之作編成詩二卷補上，並作《因繼集重序》，又將其與劉禹錫唱和之作，編為《劉白唱和集》²。他們都曾在長安、四川、蘇州、洛陽擔任官職，並居住過一段時間的經歷。

即使劉禹錫與白居易的一生，存在著這麼多相同的特點，但兩人的生活經驗及生命情調仍是差異甚大；這是本文將要討論的重點。

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的青年時期

根據《舊唐書·劉禹錫傳》所載，劉禹錫是「彭城人，祖雲，父激，仕歷州縣令佐，世以儒學稱」（卷一六〇、頁四二一〇），而劉禹錫自撰的《子劉子自傳》中則說「其先漢景帝賈夫人子勝封中山王，諡曰靖，子孫因為中山人。……七代祖亮，事北朝為冀州刺史敬騎常侍，遇遷都洛陽，為北部都昌里人，世為儒而仕。……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鎰，……殿中侍御史贈尚書祠部郎中，父緯緒，亦以儒學天寶末應進士，遂及大亂，舉族東遷，……為淮西從事，本府就加鹽鐵副使，遂轉殿中，主務於埭橋」。《子劉子自傳》中所說系出漢中山靖王之後，學者多認為是依託；可以確定的是劉禹錫家族確係北朝後期新興的虜姓士族。「世以儒學稱」、「世為儒而仕」是魏晉以來先世以軍功起家、後裔轉以儒學見稱的士族發展的一種規律³。劉禹錫的父親因避安史之亂，遷居蘇州，劉禹錫便是出生於嘉興縣⁴，一直到十九歲才北游長安。

至於白居易家族，則可說是標準的下級官吏家庭，雖然白居易曾明確表示其先世為北齊五兵尚書白建，但陳寅恪先生在〈白樂天之先祖及後嗣〉一文，已推翻這樣的說法，認為純屬依託。白居易的家世，可以確實知曉的是曾祖白溫，官檢校都官郎中。祖父白鎰，自幼好學，善於文章，尤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十七歲明經及第，官至河南府鞏縣令。父白季庚，天寶末明經及第，因建中年間藩鎮大亂之際，在徐州彭城令任上立功，所以以州別駕的身分知州事，卒於襄州別駕

頁，漢京文化公司。

² 如果以詩集編成的時間為次序的話，其先後分別為唐文宗大和二年（西元八二八年）的續《因繼集》；大和三年（西元八二九年）的《劉白唱和集》；大和六年（西元八三二年）的《吳蜀集》及大和七年（西元八三三年）的《彭陽唱和集》。

³ 以上論證可以參考黃永年〈所謂永貞革新〉一文，收於《唐代史事考釋》，頁三八三～三八四，聯經。

⁴ 劉禹錫〈送斐處士應制舉〉詩「憶得童年識君處，嘉禾（即嘉興）驛後聯牆住。垂鈞釣得王餘魚，踏芳共登蘇小墓。此事今同夢想間，想看一笑且開顏。」見《全唐詩》卷三五六，頁三九九八。

任上。白居易未仕之前的經歷，《新、舊唐書》均無具體記載，許大暢先生〈白居易未仕前經歷淺探〉一文，針對朱金城先生《白居易年譜》的錯誤，指出白居易根本不曾長期流落江南，而是住在秦楚之間的魯地徐州。他在十四歲那年冬自符離起程，立春後入越，十五歲春游蘇州、杭州，九月西歸⁵。

出生於胡人血統並成長於江南的劉禹錫，與出生於漢人血統且成長於北方的白居易，在青少年時期刻苦學習的態度上，卻是相當一致的。劉禹錫在〈遊桃源一百韻〉中回憶道：「紛吾本孤賤，世業在逢掖。九流宗指歸，百氏旁摺摭。」⁶「九流」、「百氏」包括大量書籍，不下相當的功夫是絕對讀不完的。而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一文也描述：「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

雖然唐代取士，本來就重視儒學與詩賦的習作，但劉禹錫顯然在儒學的學習上，表現出比白居易更強烈的意願與興趣。《唐語林》卷二、一九九條「劉禹錫云：與柳八、韓七詣施士 聽《毛詩》」；二二〇條「劉禹錫曰：《春秋》稱『趙盾以八百乘』。凡帥能約『以』，由也，由趙盾也」；二二一條「又曰：王莽以羲和為官名，如今之司天臺，本屬太史氏。故《春秋》史魚、史蘇、史亶，皆知陰陽術數也」⁷。這些記載充分說明了劉禹錫在經學上的造詣；所以呂正惠先生說：

劉、柳等人參與王、韋集團，值得重視的不只是他們以一個文人小團體加入一個大規模的政治活動而已。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礎。據《唐語林》所載，劉禹錫、柳宗元、韓泰曾連袂拜訪施士 ，聽施氏講《毛詩》，其時間應在貞元十八年年底之前。似乎他們對經學頗有興趣。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劉、柳集團跟陸質(陸淳)春秋學的關係。陸質春秋學承自啖助、趙匡，開兩宗疑經及會通三傳說《春秋》的風氣，在唐宋經學史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可

⁵ 見《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九三年第三期，頁六三～六八。

⁶ 見《全唐詩》卷三五五，頁三九八〇。

⁷ 見《唐語林校證》上冊，頁一二七～一四〇，中華書局。

以說陸氏是劉、柳、呂溫等人思想上的導師。⁸

清人沈德潛《說詩碎語》中表示「大曆十子後，劉夢得骨幹氣魄又似高於隨州（劉長卿）。人與樂天並稱，緣劉、白有唱和集耳。白之淺易，未可同日語也」⁹。沈德潛特別稱讚劉禹錫「骨幹氣魄」，實與他年輕時打下紮實的儒學思想基礎，有密切的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時期都在江南度過的劉禹錫，較北方的白居易生活安定。以唐代詩人佔籍的資料分析，其中京畿道二二六人，京兆府佔一八六人；關內道六人；都畿道二〇〇人，河南府一二〇人；河南道一五七人；河東道一四九人，蒲州佔七九人；河北道二四五人；山南東道七七人；山南西道四人；隴右道二七人；淮南道六〇人；江南東道四〇四人；江南西道一五九人；黔中道〇人；劍南道六六人；嶺南道二七人¹⁰。如果我們透過詩人佔籍數以為了解社會安定、經濟繁榮與文化水平指標的話，不難發現北方籍詩人比例超出南方，而南方則相對集中的是江南東西道。劉禹錫自幼活動的江南地帶，自六朝以來就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和人才資源的中心。江南文化的發達，江南的富饒與安定，也許是劉禹錫早於白居易登進士第的原因之一。

劉禹錫在貞元九年（西元七九三年）登進士第，同年又登博學宏詞科，貞元十一年（西元七九五年）應吏部取士科考試合格，授太子校書之職；此時劉禹錫才二十四歲。出身於極重視儒學教育家庭的劉禹錫，並不甘於以文章家庭自居，他的從政態度與思想觀點，顯然受當時從啖助、趙匡、陸質所倡導的不拘空名、從宜救亂的經世儒學的強烈影響。劉禹錫主張不固守經典，不拘泥於物，因時制宜，因事變化，付之於心，於理無悖，將現實作為最主要的關懷對象；所以，重視民生、關心民間疾苦並力求除弊安民，是劉禹錫積極追求的目標。為了使所學的理论能與現實結合，劉禹錫參加王叔文集團，把握機會，改革政治。《舊唐書》〈俱文珍傳〉敘述：

順宗即位，風疾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與牛美人待病。美人受旨

於帝，復宣之於忠言，忠言援之王叔文。叔文與朝士柳宗元、劉禹錫、

韓曄等圖議，然後下中書，俾韋執誼施行，故王之權振天下。（卷一

⁸ 見《元和詩人研究》，頁七八～七九，東吳博論。

⁹ 見《清詩話》，頁五四一。

¹⁰ 見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唐詩人佔籍考》，頁一三八～一七〇，中國社科，一九九七·十。

八四)

清人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卷七四〈順宗紀所書善政〉條云：

叔文之柄用，僅五六月耳，《舊書·順宗記》所書善政，皆在此五六月中。如二月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刺史。甲子，諸道除正敕率稅外，諸色雜稅並宜禁斷，除上供外，不得別有進奉。三月庚午，出宮女三百人於安國寺，又出掖庭教坊女樂六百人於九仙門，召其親族歸之。五月己巳，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六月丙申，二十一年十月以前百姓所欠諸色課利租賦錢帛，共五十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一貫石匹束並除免。七月丙子，贈故忠州別駕陸贄部尚書，諡曰宣。贈故道州刺史陽城為左敬騎常侍。以上數事，黜聚斂之小人，褒忠賢於已往，改革積弊。加惠窮民，自天寶以至貞元，少有及此者。

王叔文主政的五六個月中，所有的政治措施都是針對當時客觀實際情況制定的，對百姓有極大的好處；王叔文的施政理念與劉禹錫的思想主張契合，也難怪劉禹錫會把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全力以赴地在這場政治改革中發揮一己最大的能力。

當劉禹錫全心全力地投入「永貞革新」之時，白居易人也在長安，當著校書郎的小官；因為官職太低，無緣參與此次改革，可是他當時也曾上書給宰相韋執誼，提出一些政治建議。不久，「永貞革新」失敗，「二王八司馬」¹¹遭到最嚴酷的貶謫，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韋執誼被貶為崖州司馬。整個事件對白居易的

¹¹王叔文集團的主要人物為王叔文、王伾、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準、程異等，通稱「二王八司馬」。

思想的產生影響，從他的〈寄隱者〉一詩可知。

賣藥向都城，行憩青門樹。道逢馳驛者，色有非常懼。親族走相送，
欲別不敢往。私怪問道旁，何人復何故？云是右丞相，當國握樞務。
祿厚食萬錢，思深日三顧。昨日延英對，今日崖州去。由來君臣間，
寵辱在朝暮。青青東郊草，中有歸山路。歸去臥雲人，謀身計非誤。

(《全唐詩》卷四二四、頁四六六九)。

該詩呈現出莫大的震驚，而革新失敗和革新者遭遇之淒慘，也在他心中留下了陰影。

與劉禹錫稍有不同，白居易入朝為左拾遺時，唐代的政局剛度過最紊亂、最動盪的貞元、永貞時期，而進入較安定、較開明的元和時期。元和三年五月（西元八〇八年）到元和五年五月（西元八一〇年）間白居易任左拾遺，屢陳時政，不遺餘力。此外還透過元和三年完成的〈新樂府〉五十首，元和五年完成的〈秦中吟〉十首，企圖利用文學創作達到政治的目的。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說：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
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
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核而實，使採
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律，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
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全唐詩》卷四二六、
頁四六八九)。

同樣在〈秦中吟〉前也有小序寫道：

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
〈秦中吟〉。(《全唐詩》卷四二五、頁四六七三)。

後來白居易在〈傷唐衢〉一詩中，回憶擔任左拾遺期間的創作說：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
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貴人皆怪怒，閒人亦非訾。
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全唐詩》卷四二四、頁四六六三)

另外他在〈寄唐生〉一詩中也寫道：

……憐君頭半白，其志竟不衰。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
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畫規。功高虞人箴，痛苦騷人
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未得天子
知，甘受時人嗤。……(《全唐詩》卷四二四、頁四六六三)

由此可見白居易作諷喻詩的動機，非常鮮明，正如他在〈與元九書〉中所說：

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
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別憂勤，次
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

白居易寫〈新樂府〉、〈秦中吟〉時，希望能藉著這些作品救濟人病，裨補時闕，
以作為朝廷改革弊端的參考。年輕的白居易，知道自己「始得名於文章」的優勢，

充分利用文學創作為他的利器。如果說劉禹錫是以「儒學」來經世的話，那白居易無疑的就是以「文學」來經世了。

元和五年（西元八一〇年）五月五日，白居易遷官京兆府戶曹參軍，元和六年（西元八一一年）母陳氏卒，退居下邳，元和八年（西元八一三年）服除後仍居下邳，直到元和九年冬（西元八一四年），召援太子左贊善大夫。好景不常的是，到了元和十年六月（西元八一五年），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遭平盧節度使李師道勾結宦官，派中岳寺僧人圓淨行刺，武元衡當場身亡，裴度則受重傷。對這樁重大事件，白居易即刻上疏請捕殺刺客，以肅法紀¹²。宰相以白居易乃東宮之官不宜先臺諫言事，乃奏貶刺史，後追改江州司馬。

武元衡被盜殺一事，劉禹錫、柳宗元都有作品討論，由〈代靖安佳人怨〉一文可以看出劉禹錫對此事的看法。《全唐詩》卷三六五，在〈代靖安佳人怨〉詩前有引：

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年六月。公將朝。夜漏未盡三刻。

騎出里門。遇盜。斃於牆下。初公為郎。余為御史。繇是有舊故。今

守遠服。賤不可以誅。又不得為歌詩聲於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裨於

樂府云。

原詩為：

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

人。

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牆東便是傷心地，夜夜流螢飛去

來。（頁四一二〇）

¹²白居易〈與楊虞卿書〉有云：「……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髓，磔發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為書籍以來，未有此筆。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吠歆皂隸之臣，不當默默。沅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

從這兩首詩看來，表面上雖是憑弔武元衡，但實際上卻是有一種旁觀者幸災樂禍的快意存在。劉禹錫謫居朗州之後得仕途不遂，與武元衡執政有密切的關係，也難怪劉禹錫會在詩中表現出來。所以，劉、白二人對此事態度截然不同。

劉禹錫之於順宗，白居易之於憲宗，都可以顯現兩人熱烈投身於政治的身影。他們積極參政，言人之所不敢言，將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的責任表現到極致；可是接踵而來的貶謫，使他們的生命形態在頃刻間產生逆轉。對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而言，貶謫既意味著一種人格的蹂躪和自由的扼殺，又標誌著一種最沉重的憂患和最高層次的生命體驗¹³。戴偉華先生在〈唐代文學研究中的文人空間排序〉一文中說：

文人的生存需要自己的空間，文人的生活變化也會時刻改變著自己的生存空間，如文士受到貶謫，就頃刻間失去原有的空間序列，而會重新建立一個空間組合。……因此，文人的空間組合並不是固定不變的，當一個文人進入了新的空間排序，則意味著他原在的空間排序已被改變，甚或被解析而喪失。也正因為如此，文人的空間聚合與分離給文化帶來刺激，給文學發展帶來生機¹⁴。

白居易在長安任官的幾年，劉禹錫一直謫居於朗州。《舊唐書》〈劉禹錫傳〉說：「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論謂：「夢得佳詩，多在朗、連、夔、和詩作，主客以後，始事疏縱，其與白傅唱和著，大多老人衰颯之音」。劉禹錫大部分的作品都寫於貶謫之間。貶謫的苦難改變了詩人的生活，但對命運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又成了詩人最佳藝術創作的動力。這些呈現頑強生命力的作品，常成為文學中的瑰寶。貶謫朗州的劉禹錫，將他滿腔的憤懣，高度的自信與對現實的不妥協，化為一篇篇的諷喻詩。如〈聚蚊謠〉、〈飛鳶操〉、〈有獺吟〉、〈昏鏡詞〉、〈百舌吟〉、〈鶡鴒吟〉等。其中〈聚蚊謠〉一首把宦官、佞臣等趨炎附勢的小人比喻為蚊蟲，強烈地表示對他們的深惡痛絕，詩云：

¹³ 有關貶謫議題，可以參考尚永亮〈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文津，一九九三初。

¹⁴ 見《唐代文學研究叢稿》，頁四〇，學生，一九九九初。

沉沉夏夜閑堂開，飛蚊伺暗聲如雷。嘈然歛起初駭聽，殷殷若自南山來。喧騰鼓舞喜昏里，昧者不分聰或惑。露華滴瀝月上天，利嘴迎人看不得。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眾能我傷。天生有時不可遏，為爾設幄潛匡床。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全唐詩》卷三五六、頁四〇〇〇)。

全詩用極為誇張的手法，描繪飛蚊的不可一世、神氣活現的神態；最後則低調道出，它們的下場只配餵食丹鳥。在嬉笑怒罵中，全詩呈現深切的寓意。

由此看來，劉禹錫與白居易都寫諷喻詩。劉禹錫在從政受挫的情況，借諷喻詩來諷刺當時的政治，發洩個人的不滿情緒。白居易的諷喻詩則是直諫，把擔任左拾遺的本分，透過詩歌來完成；所以白居易的諷喻詩有功利之用的目的。

貳、衣帶漸寬、終究不悔的壯年時期

劉禹錫所貶謫的朗州，即今日的湖南常德，恰巧是屈原當年流放所在，而劉禹錫的住處，就在後人為紀念屈原而修建的招屈亭旁。在這強大的氛圍影響下，劉禹錫更在作品中表現對屈原的敬仰。在〈酬朗州崔員外與任十四兄侍御同過鄙人舊居自懷之什時守吳郡〉中，劉禹錫說：

昔日居鄰招屈亭，楓林橘樹鷓鴣聲。一辭御苑青門去，十見蠻江白芷生。……(《全唐詩》卷三五九、頁四〇五四)。

在這裏居住的十年間，劉禹錫看到了鄉民為紀念屈原而舉行的競渡活動；撫今追昔，不由得感慨道：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 從此起。楊桴擊節雷闐闐，亂流齊盡聲轟然。蛟龍得雨 鬣動，蟾蜍飲河

形影聯。刺史臨流褰翠幃，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鳴餘勇爭鼓舞，未至
銜枚顏色阻。百勝本自有前期，一飛由來無定所。風俗如狂重此時，
縱觀雲委江之湄。綵旅夾岸照蛟室，羅 凌波呈水嬉。曲終人散空愁
暮，招屈亭前水東注。(〈競渡曲〉見《全唐詩》卷三五六、頁四〇〇
二)。

熱烈的競渡氣氛，在繁華事散之後，更顯出孤寂的悲涼，而在這一片孤獨的情思中，更深蘊著劉禹錫對屈原的追念；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痛苦，使同是淪落此天涯的劉禹錫，在身心各方面都染上屈原的色彩。如〈遊桃源一百韻〉中寫道：

……嘗聞履忠信，可以行蠻貊。自述希古心，忘恃千時畫。巧言忽成
錦，苦志徒食蘗。平地生峰巒，深心有柔戟。層波一震盪，弱植忽淪
溺。北諸弔靈均，長岑思亭伯。禍來昧歲兆，事去空歎息。……(《全
唐詩》卷三五五、頁三九八〇)。

朗州的一花一木、一草一樹，對劉禹錫而言，都負載著沉重的屈原精神；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詩人思左懷鄉的情緒，分外深刻。在〈題招隱寺〉詩中，他寫道：

……楚野花多思，南禽聲例哀。殷勤最高頂，閒即望鄉來。(《全唐詩》
卷三五八、頁四〇四三)。

南地的奇異風光，非但無法讓劉禹錫忘掉憂愁，反而更時時刺激著他，不得不憶起他的逐客身分。〈酬端州吳大夫夜泊湘川見寄一絕〉云：

夜泊湘川逐客心，月明猿苦血沾襟。湘妃舊竹痕猶淺，從此因君染更深。(《全唐詩》卷三六五、頁四一一八)。

全詩把逐客的哀怨情緒，通過猿啼血、湘妃淚渲染到極致。〈採菱行〉一詩中也說：

……屈原祠下沉江水，月照寒波白煙起。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全唐詩》卷三五六、頁四〇〇七)。

對於被貶謫的詩人來說，京城長安便成爲無比懷念執著追尋的對象。〈謫居悼往〉說：

邑邑何邑邑，長沙地卑濕。樓上見春多，花前恨風急。猿愁腸斷叫，鶴病翹趾立。牛衣獨自眠，誰哀仲卿泣。

鬱鬱何鬱鬱，長安遠如日。終日念鄉關，燕來鴻復還。潘岳歲寒思，屈平 顏。殷勤望歸路，無雨即登山。(《全唐詩》卷三五五、頁三九八四)。

所謂「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對執著於理想、頑強對抗命運的詩人來說，使他觸景生悲的楚地楚物，更激發了他那心懷宿昔典型、勇敢面對磨難的悲劇精神；這種精神使劉禹錫的作品在生命層次的展現上，凸顯著更深刻的意涵。

在朗州生活十年之後的劉禹錫，除了在詩歌內容上受屈原影響外，就連詩歌的創作動機與形式也都受到屈原的影響。如劉禹錫的名作《竹枝詞》九首，詩前引曾記載：

四方之歌，異音而同樂。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

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為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
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儻儻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豔音。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
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颺之。附于末，後之聆巴歙，知變風之自焉。(《全唐詩》卷三六五、頁四一一二)。

〈竹枝詞〉這種模仿民歌音調而又似七絕形式的作品，在初、盛唐時代還未曾出現過，可以說是劉禹錫獨創的表現方式。而作於長慶四年（西元八二四年）的〈別夔州官吏〉一詩：

三年楚國巴城守，一去揚州揚子津。青帳聯延喧驛步，白頭俯偃到江濱。
巫山暮色常含雨，峽水秋來不恐人。惟有九歌詞數首，里中留與賽蠻神。(《全唐詩》卷三六一、頁四〇八二)。

內容更可以看出屈原對劉禹錫的影響是終其一生，而非僅止於朗州的十年。

相對於劉禹錫之追隨屈原，被貶到江州的白居易，對屈原的態度卻相當保留。〈詠懷〉一詩說：

自從委順任浮沉，漸覺年多功用深。面上減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
妻兒不問唯耽酒，冠蓋皆慵只抱琴。長笑靈均不知命，江籬叢畔苦悲吟。(《全唐詩》卷四三九、頁四八八九)。

在這首詩中，白居易明白表示不贊同屈原那種過於執著，以悲吟自苦的人生態度。有時候白居易還會通過比較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政治認同。如〈讀史〉五首中的第一首說：

楚懷放靈均，國政亦荒淫。彷彿未忍決，繞澤行悲吟。漢文疑賈生，
謫置湘之陰。是時刑方措，此去難為心。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沉。
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全唐詩》卷
四二五、頁四六七九）。

又〈偶然〉詩亦云：

楚懷邪亂靈均直，放棄合宜何惻惻。漢文明聖賈生賢，謫向長沙堪歎
息。人事多端何足怪，天文至信猶差忒。月離于畢合滂沱，有時不雨
何能測。（《全唐詩》卷四三九、頁四八九三）。

號為「樂天」的白居易，自然不會選擇像屈原一般的「獨善」道路，而初、盛唐詩人所推崇的賈誼，也不是白居易追效的對象。要超越屈原模式，要擺脫賈誼的影響，要貼切自己的個性，要能瀟灑地解脫於現實，白居易選中了陶淵明。

其實早在元和八年（西元八一三年）白居易丁母憂羈於下邳時，即創作了〈效陶潛體詩十六首〉，詩前有序云：

余退居渭上，杜門不出，時屬多雨，無以自娛。會家醞新熟，雨中獨
飲，往往酣醉，終日不醒，懶放之心，彌覺自得。故得於此，而有以
忘於彼者。因詠陶淵明詩，適與意會，遂效其體，成十六篇。醉中狂
言，醒輒自哂，然知我者亦無隱焉。

白居易在這段期間，沉醉在「懶放之心，彌覺自得」的另一番情境之中，無意於社會、政治、名利的角逐。此時〈詠陶淵明詩〉，更體會出生命是可以達到不受

世事羈絆，可以無拘無束的自由開展。讀其詩而思其人，所以在第十二首〈效陶潛體詩〉寫道：

吾聞潯陽郡，昔有陶徵君。愛酒不愛名，憂醒不憂貧。嘗為彭澤令，
在宦讒八旬。愀然忽不樂，挂印著公門。口吟歸去來，頭戴漉酒巾。
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歸來五柳下，還似酒養真。人間榮與利，
擺落如泥塵。先生去已久，紙墨有遺文。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
我從老大來，竊慕其為人。其他不可及，且做醉昏昏。(《全唐詩》卷
四二八、頁四七二一)。

不過白居易真正較深入地了解陶淵明，在精神上契合陶淵明是在他被貶謫到江州之後。白居易被貶謫的江州，即今江西九江，陶淵明的故里柴桑即在江州。地域的巧合，再加上昔日的印象，使白居易對陶淵明產生極大的愛慕與熱情；於是，他開始全心全意地擁抱陶淵明。我們且看他在江州司馬任上寫的〈題潯陽樓〉詩：

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瀟閒。今朝登此樓，
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見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鑪峰煙。
清輝與靈氣，日夕供文篇。我無二人才，熟為來其間。因高偶成句，
俯仰愧江山。(《全唐詩》卷四三〇、頁四七四〇)。

在這首詩中，白居易讚美陶淵明與韋應物，在文采的背後還包含著對兩人高風亮節的人格欽慕，而陶、韋之所以能如此，在於大塊所假之文章，登潯陽樓眺望的白居易，豈能不思與之同調。生活在江州的白居易，沈浸在陶淵明的氛圍中，愈覺得自己與陶淵明的關係日漸密切。他在〈訪陶公舊宅〉詩中序文寫道：

余夙慕陶淵明為人，往歲涓上閒居，嘗有效陶體詩十六首。今遊廬山，

經柴桑，過栗里，思其人，訪其宅，不能默默，又題此詩云。

白居易對陶淵明的欽慕與重視，由此段序文可知。但從此詩的內容，更可以看出白居易期盼自己能師法陶淵明的傾向。詩云：

垢塵不污玉，靈鳳不啄糞。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守，
口終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陽山。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為難。
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饑寒。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徵竟不起，
斯可謂真賢。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
昔常詠遺風，著為十六篇。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尊有酒，
不慕琴無弦。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
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煙。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逢姓陶人，
使我心依然。（《全唐詩》卷四三〇、頁四七四〇）。

此詩對於陶淵明的不慕榮利、安於貧窮的堅持，一再稱羨，雖然兩人相隔五百年，但柴桑的人、事、物對白居易而言，都有著一份因陶淵明而產生的親切感。

白居易對陶淵明的嚮往與有意的效法，連劉禹錫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劉禹錫在〈和樂天閒園獨賞八韻前以蜂和拙句寄今辱蝸蟻妍詞見答因成小巧以取大哈〉一詩中說：

永日無人事，芳園任興行。陶廬樹可愛，潘宅雨新晴。……（《全唐詩》卷三六二、頁四〇九二）。

又〈答樂天戲贈〉也說：

才子聲名白侍郎，風流雖老尚難當。詩情逸似陶彭澤，齋日多如周太常。……（《全唐詩》卷三六〇、頁四〇六四）。

雖然劉禹錫貶謫至朗州，因地域的巧合，追尋屈原之遺風，白居易謫至江州，慕陶潛之亮節而有所不同，但對於這兩位謫居異地的詩人，長安那座具有象徵意義的故鄉，卻同是永恆的執著。劉禹錫如此，白居易亦如此。在後者的詩句中，頻頻出現「夜夢歸長安，見我故親友」、「春來觸地故鄉情，忽見風光憶兩京」、「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思」¹⁵的字句，另外從〈自江州司馬援忠州刺史仰荷聖澤聊書鄙誠〉一詩，也可以看出他的無奈，及其對世事的調侃：

炎瘴拋身遠，泥塗索腳難。網初鱗撥刺，籠久翅摧殘。雷電頒時令，陽和變歲寒。遺簪承舊念，剖竹授新官。鄉覺前程近，心隨外事寬。生還應有分，西笑問長安。（《全唐詩》卷四四〇、頁四九一〇）。

曠達如白居易都已如此，執著如劉禹錫對長安的依戀當然就更強烈了。白居易任江州司馬近三年的時間，後來得到好友崔群的幫助，在元和十三年（西元八一八年）升任忠州刺史，忠州為今日四川忠縣，白居易在忠州住了近兩年的時間，在元和十五年（西元八二〇年）夏奉召回長安任司門員外郎。十二月援主客郎中之職，並知制誥。紛擾的長安政局，令白居易起了離開的念頭，在穆宗長慶二年（西元八二二年）他便赴杭州任刺史。在杭州待了愉快的三年，在敬宗寶歷元年（西元八二五年）轉赴蘇州刺使。同樣的這段期間，劉禹錫從朗州回到長安，旋即被貶連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十一月（西元八一九年），劉禹錫因母喪，奉柩返洛陽，直到穆宗長慶元年十月（西元八二一年），任夔州刺史，夔州為今四川奉節。長慶四年夏（西元八二四年）劉禹錫轉任和州刺史，和州是今日安徽縣和縣。在這段漫長奔波的歲月中，劉禹錫與白居易幾乎如參星、商星一般，錯過相見的機會。

參、驀然回首、無雨無晴的晚年時期

直到敬宗寶歷二年（西元八二六年），白居易以病免蘇州刺史，劉禹錫罷和

¹⁵ 三詩分別見《全唐詩》，卷四三三〈夢與李七庚三十三同訪元九〉，頁四七九五；卷四四〇〈春來〉，頁四八九九；卷四三九〈山中問月〉，頁四八九一。

州刺史，二人在返洛陽途中相遇於揚州。在酒席上感慨萬千的白居易，即席寫了一首〈醉贈劉二十八使君〉詩：

為我引杯添酒飲，與君把箸擊盤歌。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全唐詩》卷四四八、頁五〇三八)。

劉禹錫當場也寫了一首答詩〈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作爛柯人。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全唐詩》卷三六〇、頁四〇六一)。

五十五歲的劉禹錫與白居易，浮沉宦海，歷經人生最輝煌、最凶險的壯年，一朝相遇，互相欣賞疼惜之情立刻湧現。白居易說：「亦知命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從貞元二十一年到寶曆二年，前後恰共二十三年。白居易委婉地表示對劉禹錫的同情與讚美。劉禹錫的詩接下去說：「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這一來一往間，兩人的推心置腹已顯而易見。詩最後又說：「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劉禹錫在白居易的熱情關懷下，表示要振作起來，重新投入生活。

劉禹錫與白居易在揚州一起同遊棲靈塔，並留下詩作，劉詩題為〈同樂天登棲靈寺塔〉：

步步相攜不覺難，九層雲外倚闌干。忽然笑語半天上，無限遊人舉眼看。(《全唐詩》卷三六五、頁四一二一)。

白詩題為〈與夢得同登棲靈塔〉：

半月悠悠在廣陵，何樓何塔不同登。共憐筋力猶堪在，上到棲靈第九

層。(《全唐詩》卷四四七、頁五〇三六)。

劉、白同遊揚州，結伴北返。從此在人生的旅途上「步步相攜」、「共憐筋力」，相知相惜。自此之後，劉、白酬唱作品遂多。

唐文宗大和二年（西元八二八年），劉禹錫爲主客郎中、集賢殿學士，白居易任刑部侍郎，兩人俱居長安，酬唱作品往返不絕。白居易寫〈聞新蟬贈劉二十八〉，詩云：

蟬發一聲時，槐花帶兩枝。只應催我老，兼遣報君知。白髮生頭連，
青雲入手遲。無過一杯酒，相勸數開眉。(《全唐詩》卷四四九、頁五
〇五九)。

劉禹錫看到白居易詩時，亦寫了一首〈酬樂天聞新蟬見贈〉回應：

碧樹鳴蟬後，煙雲改容光。瑟然引秋氣，芳草日夜黃。夾道喧古槐，
臨池思垂楊。離人下憶淚。志士激剛腸。昔聞阻山川，今聽同匡床。
人情便所遇，音韻豈殊常。因之比笙竽，送我遊醉鄉。(《全唐詩》卷
三五五、頁三九八七)。

經過了一年之後，蟬聲再次響起，劉禹錫憶起去年此時，白居易仍在長安，今年又聞蟬聲，白居易已於四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至洛陽，聚少離多，不勝感慨，又寫了一首〈始聞蟬有懷白賓客去歲白有聞蟬見寄詩云祇應催我老兼遣報君知之句〉：

蟬韻極清切，始聞何處悲。人含不平意，景值欲秋時。此歲方畹畹，
誰家無別離。君言催我老，已是去年詩。(《全唐詩》卷三五八、頁四

0 二九 》。

在洛陽接到此詩的白居易，面對匆匆又過一年，無計可施的惆悵，又題了一首〈答夢得聞蟬見寄〉回應：

開緘思浩然，獨詠晚風前。人貌非前日，蟬聲似去年。槐花新雨後，
柳影欲秋天。聽罷無他計，相思又一篇。（《全唐詩》卷四五〇、頁五

0 七八 》。

好友相隔兩地，終究不能無憾，所以劉禹錫在白居易要出發到洛陽任職時，寫下〈刑部白侍郎謝病長告改賓客分司以詩贈別〉說：

鼎食華軒到眼前，拂衣高謝豈徒然。九霄路上辭朝客，四皓叢中作少
年。他日臥龍終得雨，今朝放鶴且沖天。洛陽舊有衡茆在，亦擬抽身
伴地仙。（《全唐詩》卷三六〇、頁四〇六四）。

詩中預告了不久之後，劉禹錫必將選擇洛陽作為長居之地。果然在唐文宗開成元年（西元八三六年），劉禹錫亦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的身分，與白居易相聚洛陽。

人生得一知己之難，難於上青天；看到劉禹錫與白居易的唱和之作，同喜同悲的情懷，令人稱羨。大和五年（西元八三一年）六十歲遭喪子之慟的白居易，寫下〈哭崔兒〉、〈初喪崔兒報微之晦叔〉二詩：

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豈料汝先為異物，常憂吾不見成
人。悲腸自斷非因劍，啼眼加昏不是塵。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
鄧攸身。

書報微之晦叔知，欲題崔字淚先垂。世間此恨偏敦我，天下何人不哭

兒。蟬老悲鳴拋蛻後，龍眠驚覺失珠時。文章十帖官三品，身後傳誰
庇廕誰。(《全唐詩》卷四五一、頁五一〇〇)。

聽到消息的劉禹錫，馬上寫了〈吟白樂天哭崔兒二篇愴然寄贈〉：

吟君苦調我霑纓，能使無情盡有情。四望車中心未釋，千秋亭下賦初
成。庭梧已有棲雛處，池鶴今無子和聲。從此期君比瓊樹，一枝吹折
一枝生。(《全唐詩》卷三六〇、頁四〇六四)。

劉禹錫此詩充滿了對白居易遭遇的憂傷與同情，除此之外，更對好友有著百般的
安慰與期待。經過喪子的白居易，對劉禹錫的感謝及依賴，愈來愈明顯。在〈寄
劉蘇州〉詩中，他說：

去年八月哭微之，今年八月哭敦詩。何堪老淚交流日，多是秋風搖落
時。泣罷歲迴深自念，情來一倍苦相思。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卻蘇州
更有誰。(《全唐詩》卷四四九、頁五〇七〇)。

他們互相扶持，度過悲傷，他們也一樣能同醉同狂，共享歡娛。白居易〈醉中重
留夢得〉詩云：

劉郎劉郎莫先起，蘇台蘇台隔雲水。酒釀來從一百分，馬頭去便三千
里。(《全唐詩》卷四五〇、頁五〇八四)。

而劉禹錫也不甘示弱地寫了〈醉答樂天〉：

洛城洛城何日歸，故人故人今轉稀。莫嗟雪裏暫時別，終擬雲間相逐

飛。(《全唐詩》卷三六五、頁四一二二)。

等到劉禹錫到了洛陽，兩人的聚會就更狂放了。白居易有〈贈夢得〉一詩：

前日君家飲，昨日王家宴，今日過我廬，三日三會面。當歌聊自放，
對酒交相勸。為我盡一杯，與君登三願。一願世清平，二願身強健，
三願臨老頭，數與君相見。(《全唐詩》卷四五九、頁五二一八)。

另外一首也是〈贈夢得〉詩中說：

年顏老少與君同，眼未全昏耳未聾。放醉臥為春日伴，趁歡行入少年
叢。尋花借馬煩川守，弄水偷船惱令公。聞道洛城人盡怪，呼為劉白
二狂翁。(《全唐詩》卷四五六、頁五一七七)。

對於這份遲來的友誼，白居易除了感歎造化弄人之外，卻是十分珍惜的，在他的〈夢得前所酬篇有鍊盡美少年之句因思往事兼詠今懷重以長句答之〉一詩中說：

鍊盡少年成白首，憶初相識到今朝。昔饒春桂長先折，今伴寒松最後
凋。〔昔登科第，夢得多居先，今同暮年，洛下為老伴〕生事縱貧猶
可過，風情雖老未全銷。聲華寵命人皆得，若箇如君歷七朝。〔夢得
貞元中及今，凡仕七朝也。〕(《全唐詩》卷四五八、頁五二〇二)。

天下終究沒有不散的宴席，劉禹錫仍較白居易更早撒手於人世；孤獨無友的白居易，寫下悲愴至極的〈感舊〉詩：

晦叔墳荒草已陳，夢得墓溼土猶新。微之捐館將一紀，杓直歸丘二十春。城中雖有故第宅，庭蕪園廢生荊榛。篋中亦有舊書札，紙穿字蠹成灰塵。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四人先去我在後，一枝蒲柳衰殘身。豈無晚歲新相識，相識面親心不親。人生莫羨苦長命，命長感舊多悲辛。(《全唐詩》卷四五九、頁五二二三)。

達觀如白居易，在知己一一凋零後，其感傷無人能訴；昔日劉禹錫尚能與他分享快樂，分擔憂愁，劉禹錫一死，他的憾恨，累積到最深，化爲〈哭劉尚書夢得〉二首，令人讀之鼻酸。詩云：

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同貧同病退閒日，一死一生臨老頭。杯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賢豪雖歿精靈在，應共微之地下遊。

今日哭君吾道孤，寢門淚滿白髭鬚。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脣亡齒亦枯。窅窅窮泉埋寶玉，駸駸落景挂桑榆。夜臺暮齒期非遠，但問前頭相見無。(《全唐詩》卷四五九、頁五二三四)。

結語

唐代的詩人多在互動中從事創作，從劉禹錫與白居易的一生，可以明顯觀察出來。影響詩人創作的因素很多，除了所處的時代環境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詩人本身的個性及其生活際遇。大多數的研究者都將目光的焦點擺在時代環境的共相，其實，每位詩人個別的殊相，更值得研究者玩味。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 55-74, No. 1, Nov. 2000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Two Hoary Congenial Spirits Returning Together: A Tentative Study on Liu Yü-hsi and Pai Chü-I's Lives and Poetic Art

*Pao-Ling Lee**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hows the creative traits expressed in Liu Yü-hsi and Pai Chü-I's poetry by parallel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talents with the vicissitudes of their lives.

The two conspicuous poets of the T'ang Dynasty had their own backgrounds of cultivation and also quite different political ups and downs, and, therefore, each expressed his peculiar views of their times his own way.

However, there was a remarkable spiritual congeniality between the two, and their friendship did significantly interact with their poetic creations.

Keywords: Liu Yü-hsi, Pai Chü-I, T'ang Dynasty, Liu-Pai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